一



序说民国时代

通常被人们称为中华民国的这段历史，前承晚清，后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管它自身如何曲折，都是二十世纪中国走过的一段非常关键的道路。如果说，自十九世纪下半叶启动的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变，至今天仍未结束的话，那么，中华民国正是这个转型时期中的重要阶段。这不仅仅是因为此期间国家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诸多特征及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具有某种普遍意义，亦即它们既是前清遗留下来的，又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共和国重新面临的；而且还因为中华民国的历史本身也是中华民族重新走向崛起的重要阶段。因而，在当代中国大变动的时代背景中，有必要也有可能重新梳理与反思这段历史。梳理这段历史的线索，社会的转型与变化大端有：

政治方面，有民国初年的共和国体、多党竞争、联省自治、武力统一；有南京国民政府自二十年代开始的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政、训政、宪政进程的设想与国民党的党国政制及其“训政”建设，全民族抗战开始后的“国民参政会”的成立及运作；有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苏区工农苏维埃政权、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与“三三制”政权；有四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宪政运动、联合政府运动、新旧政协的更替；还有导致国民党政权走向全面腐败的战后“接收”和蒋介石操纵的“制宪”、“行宪”把戏等等。这些都是民国时期中国人建设现代民主政治所走过的历程，体现了中国人对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艰辛探索。这些探索，有的取得了成功，有的尽管是昙花一现，甚至是彻底失败，却都给后人留下了历史的借鉴，是推动中国政治体制由传统的君主专制向现代的民主政治过渡与转型所作的有益尝试。民主政治已经成为中国人民认定的政治追求。

经济方面，在西方列强的外资企业大量侵入中国的同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也有成功的新发展。从民国初年以轻工业为龙头的民族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到三十年代国民政府的国防建设与重工业建设的推进，从金融方面的“废两改元”到“法币改革”，在“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全面控制中国经济之前，中国的近代工业化先后迎来了它发展的两个“黄金时期”；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则在广大的苏维埃区域与抗日根据地内，创立了崭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这些都为国家的统一与抗日民族战争的进行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基础。期间，尽管民国时期的经济建设因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官僚资本的垄断而大打折扣，尽管长期的战乱尤其是日本的侵华战争对中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但国民政府所采取的引进外国资金、技术与人才以推动中国近代工业化建设的政策以及共产党人创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经验均留下了有益的启示；抗战期间工业西迁，调整了中国工业的整体布局，使抗战大后方开始步入现代化的征途并进入了大西南第一次工业化运动，

从而对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思想文化方面，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与马列主义思想的相互论争、相互吸收，指导着当时中国社会的革命与变革。辛亥革命推动的、新文化运动揭示的“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及其与独裁、专制、迷信的斗争则贯穿民国历史的始终；五四运动及其后涌现的改造社会新思潮，新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与提出，苏区民众文化的大传播与自由派教授们的人权理念，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整风运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以及战时大后方的文化发展等等，都是东西方文化在中国斗争并存、交替融合中不可或缺的阶段。最后，随着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产生的毛泽东思想便发展为新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

外交上，中国人民成功地打破了传统的外交格局，摒弃了天朝大国的心态，迈出了改变屈辱历史的重要一步。从清末开始的修约要求到二十、三十年代的改订新约运动，再到抗战中期的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终于逐步取消了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历届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众多不平等条约；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则成就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反法西斯阵线的形成、新的国际组织—— 联合国的创建及中国世界大国的地位凸显，这些意味着中华民族开始跻身于现代世界民族之林。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中国外交中，以前不被看重的苏美两国因分别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提供了巨大的援助，已成为对中国最具影响的国家；近代以来扮演在华列强领头羊角色的英国对中国的影响力则无可挽回地开始衰落下去；长期以来对中国领土虎视眈眈、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对华威胁最大的日本再次野蛮地与中国人民兵戎相见，最后以失败投降而告终。这些显在的外交变化对中国日后的社会发

展、内政外交政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与以上四方面同行的是中华民国始终回避不了的一个基本环境：世界逐渐呈现政治两极化发展趋势，中国是为中间地带；中国正处于新旧社会转轨、新旧制度转型的过渡阶段；国家长期面临内争外患，社会始终动荡不安；国无宁日，民心思治。基于此，中华民国史可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民国肇基与制度创新阶段（1912～1916）。此期间主题为民国初创和制度创新的初步实践与其所面临的难题。民国是革命的产物，但革命并非仅仅是孙中山等革命者的主观愿望和努力所导致，还与清末迟到的新政、不合时宜的铁路国有政策、由来已久的地方主义等客观情势分不开。同时，上述主客观条件相结合缔造的中华民国也不仅仅是清朝一个朝代的结束，而是一种陈旧政体的被打破、新政体确立的开始。随后，政党政治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形成民国史上首次“参与爆炸”。尽管当时的政党政治实际非驴非马，政治体制也并非全新，但时人之努力却不应抹杀。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与中国人民起而捍卫了共和国体，转型社会与共和新制度存在的不适及民国面临的重重难题，却没有随着袁世凯的无奈“西”去而得到解决。民国社会进入了军阀纷争的时期。

（二）军阀纷争与走向新的统一阶段（1917～1928）。此期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紧张难和，中央政权走马灯似的数度易手，地方军阀割据则依然如故；知识分子投身于自己的事业，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发动了伟大的五四运动，科学和民主开始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人民心中的旗帜，马列主义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在改造社会的呼吁声中，中国共产党适时诞生。孙中山努力进行新的探索，联俄、联共，改组中国国民党，使之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开

创国民革命新篇章。然而，蒋介石以清党反共的血腥屠杀，将国民革命、北伐战争成就的伟业攫取为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基业。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重新统一了中国。

（三）内争外患与“训政”建设阶段（1928～1937）。蒋介石以政治和军事两手，击败了国民党其它新军阀，整肃了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巩固了国民党在中国中央政权的主导地位，确立了蒋介石的统治时代，国民党的党国政治、“训政”建设进入实施阶段；共产党在遭受国民党的“清党”屠杀之后，重新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新探索，走向农村，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工农武装割据；反对独裁与暴力的“第三条道路”则成为中间势力的追求，自由派教授激扬文字，也与之同行。蒋介石高唱“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实行一党独裁，发动“剿共”战争，国共争战不已；东邻日本则化垂涎为蚕食，由东北而华北，危及中华民族的生存；经过中华民族的局部抵抗，中国共产党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再经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国共停战对外，加上南京国民政府十年的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中华民族为生存而抗争的态势基本形成。

（四）抗日御侮与民族新起阶段(1937～1945)。日本全面侵华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之危险，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国共两党在两个战场上共御外侮，中国的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持久、最重要的战场之一；凭借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苦苦追求，中国开始赢得国际社会的重新审视、关注和帮助，在外交上取得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成果；国民党统治虽因遭受日军的打击而有所动摇，但其威望仍在上升，共产党在抗战中迅速崛起，一派方新之气，中间势力正在发展壮大；尽管国共两党相互摩擦不断，但两党的一致对外与持久抗战，终于共同迎来了中华民族百年抗争的伟大胜利，并为战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与人民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新的政治格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五）金陵残局黯然收场阶段（1945～1949）。自抗战后期国人就掀起的以改革国民党政权体制为中心诉求的联合政府运动在战后初期再度升温；处于均衡态势的国共两党几度协商和谈，和平步伐一步一个脚印，中华民族复兴的新机遇似乎唾手可得。然而，当权执政的国民党不顾民意，迷信武力，违逆时代潮流，以内战取代和平，与共产党重开战火，终于自觉不自觉地抛弃了社会大众，从而使国民党及其政权的改造和新生丧失了一次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导致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再次破裂，影响了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历史格局，造成了日后大陆与台湾岛的长期分裂。蒋介石时代终结了，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

一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

浩荡的世界大势

1840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泱泱中华帝国，竟受到一个昔日被称为小小“蛮夷”的交逼。只有二十余艘炮舰、总共不过万名士兵的英国军队，居然万里来征，逼犯这个东方大国。十余年后，英国和法国再度以大约两万军队，联合对这个拥有四亿以上人口和一千万平方公里面积并且仍然有些桀骜不驯的国家进行了野蛮的武力征伐。这场战争，是自西方殖民主义者1514年到中国起他们积三百二十五年窥探之后的一逞。利炮震撼了中国，坚船开始动摇了中国的古老传统。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一个界碑，它铭刻了古老的中国社会在炮口逼迫下卷入近代世界的最初一步。

其实，中国人的屈辱早已由自身酿就。还在多少世纪以前，中国传统文化的辉煌业绩和博大精深，曾令世人折服：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了誉满中外的古代“丝绸之路”；唐代高僧鉴真东渡，使唐代文明辉映东邻扶桑；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声震南洋，惠及非洲东岸、红海和麦加；特别是元朝蒙古西征，将中国四大发明进一步传播到西方，不仅为欧洲文艺复兴提供了物质基础，也对整个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然而，太古老且太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也成了中国人沉重的包袱，从而衍生出巨大的惰性，并形成了中国人长期的封闭、保守以及夜郎自大的惯性，使中国人悠悠然似乎始终生活在“天朝上国”、“华夷有分”的氛围中，对人类历史新时期的来临茫然无知，难以萌生并进一步创造出崭新的近代文明。一个西方人这样说道：要理解中国的衰落，就必须懂得中国早先取得的成就，因为这种成就之大，竟使得中国的领袖人物对于灾难的降临毫无准备。所以，近代世界是被“强加给中国人的，中国人不得不咽下去”。在我们强忍着屈辱，吞咽着这枚苦果的同时，勃勃生机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却已在中国人面前次第展开，成为坚船利炮最直接的诠释。

早在十五、十六世纪之交，新大陆的发现与环球航行的实现，在给侵略成性的西方殖民主义者以巨大的财富和刺激的同时，进而也推动了西方殖民帝国的社会变革。最早走出中世纪黑暗的英国，首先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反复拼搏，到 1688 年“光荣革命”后，终于确立了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也意味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在英国已牢固地建立起来。此后，1775 年，美国开始独立战争的征程； 1789 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这些具有世界意义的革命，不但摧毁了腐朽的封建制度，建立了民主政权，而且推动了整个欧美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开辟了欧美各国资本主义胜

利与巩固的新时期。它“把所有过去时代的垃圾都扫除干净，进而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马克思语)。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进一步确立和巩固，掌握了国家政权的英法美等国资产阶级纷纷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从而给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巨大的推动。

在英国，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率先开始工业革命，进而引起了整个英国社会的全面变革。历经半个世纪左右的发展，大工业最终以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用工厂代替了作坊，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英国社会的经济体系。恩格斯说：“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的应用，这就是十八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工业革命为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进一步加强，又反过来给英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有力的推动。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由于工业革命的发展而日益富足，更加强大。他们对英国社会的上层建筑进一步调整，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制定一套更加有利于本阶级的政策，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法国，继“热月党人”之后的拿破仑政权，忠实地代表了金融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巩固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所取得的成果，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使法国在欧洲甚至全世界获得霸权。基于这个任务，拿破仑政府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例如：给工业家以巨额津贴，用以建立新的企业；举办工业展览会，制定保护性税率；推行奖励竞赛，国家订货，实行发明专利，促进机器生产；以优厚报酬从国外招聘许多有专门技术的熟练技工，充实和提高国内各个部门的技术水平等

等。与此同时，拿破仑还通过国家立法，从法律上来确立资产阶级的利益： 1804 年颁布了“ 拿破仑民法典 ”；1807 年通过了《商法典》；1810 年又制定了《刑事法典》，成为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立法的典范。这些政策与措施，有力地扶助了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并极大地增强了其向国外拓展市场的能力。

美国在独立战争后，获得了政治上的自由，但经济上仍然处于依赖英国的地位。 1812 年至 1814 年，美国又进行了第二次反英战争，再次打败了英国，从而使美国完全摆脱了英国的控制，走上了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为了巩固和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美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扶植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如保护关税、引进和采用外国先进技术、鼓励发明创造、吸收和利用外国资本，从而使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后来居上，位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前列。

在西方上述资本主义制度先行的国家中，政治上确立了主权在民的原则，普遍实行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的治国模式；经济上推行自由市场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有力地摧毁了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及其经济基础。同时，在思想意识领域，这些国家也吹响了向封建专制主义斗争的号角。

自中世纪后期，一大批思想家和宗教改革者，就开始寻找冲出封建君主制和教皇一统天下的突破口。人才辈出的文艺复兴时期，文学艺术界、思想学术界高举人文主义的旗帜，以他们卓越的才智，向宗教神学提出挑战，锋芒直指宗教蒙昧主义。他们对基督教以神为中心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人本思想，从而把眼光由仰望苍穹神宫转向平视世俗人生。他们强调人的尊严，赞美人的伟大，追求人性解放、自由意志和现世享乐。与文艺复兴并起的宗教改革，进一步强调被神学贬低

了的人的价值。他们借助天上的平等来要求地上的平等，明确宣扬博爱精神，强调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认为人人都能进入天堂。

进入十八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汲取了中世纪以来思想家的政治构想和文艺复兴时期对宗教的批判成果，进而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构想作了空前而细致的描绘，为资本主义精神作了淋漓尽致的阐述。他极力反对“君权神授”，认为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天赋的、不可剥夺的，任何人不得侵犯他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他还宣扬政府权力的性质“不是，并且也不能是专断的”，政府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人们的财产，并提出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和联盟权三权分离的学说，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勾画出了主要轮廓。

稍后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在摧毁封建主义思想的过程中，提出了“人权”和“理性”，用自由、平等和主权在民的旗帜号召人民，反对专制主义，把近代民主自由学说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他们终生孜孜不息、不知疲倦地为自由与民主作艰苦的理论探索工作，努力建构一种新时代的精神，为新的社会确立社会关系的调节趋向与调节机制作了重要的选择。他们的思想和设计的政治蓝图深深渗进了十八、十九世纪西方的政治运动之中，并在各自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内，以不同的方式，将其融入到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活中。法国在 1789 年的《人权宣言》和 1791 年的《宪法》中，明确标榜“在权利面前，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法律是公共意志的体现”，“主权是统一的，不可分割，不可剥夺的和不可转移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美国在 1787 年联邦宪法中则明确规定合众国实行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成为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建构的楷模。

应该说，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平等、自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民主的政治思想，培育了整个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进而催生了一个较之封建社会合理的、公正的、繁荣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开创了人类文明历史的新时代。他们所确立的这些近代西方文化的基本原则和精神，随着人类时代的步伐，逐渐形成了一股浩荡的世界大势，冲击着尚在封建专制藩篱中苦苦挣扎的、诸如中国这样的东方文化国家。

中西文化的碰撞声，早在鸦片战争前便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万里远征而在中华大地回响。

明正德九年（1514 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第一艘船只绕过非洲好望角，闯到我国的广东沿海，耀武扬威。1522 年，中国军民在广东东莞县屯门港驱逐了“掳掠男妇”的葡萄牙侵略者。 1557 年，葡萄牙殖民者通过欺骗和贿赂明朝地方官吏，获准在澳门建屋居住，晾晒货物，由此取得了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国的一个桥头堡。十七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一度强占台湾北部。 1624 年，荷兰殖民者用武力霸占台湾全岛，在岛上建立起殖民统治，直到 1661 年才被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 1637 年，英国殖民主义者乘商船第一次来华。他们炮击虎门炮台，击沉中国商船和水师船只，对中国进行挑衅。在北方， 1643 年，第一批沙俄殖民者越过外兴安岭，侵入我国黑龙江地区，以后又不断骚扰我国北部边疆，以至清康熙皇帝御驾亲征，对沙俄侵略者予以迎头痛击。 1689 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

紧随殖民主义者远道而来的是传教士。他们既服务于殖民开拓，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天文知识以及地图、钟表、仪器、火炮等科学技术和其它西方文化。起初，这些新奇的西洋玩艺只供宫廷玩耍，对社会和文化阶层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有未量的传教士虽供职于朝廷或地方，但影响也很有限。然而，到了十八世纪初，即乾嘉年间，即使

是这种十分有限的中西文化交流也趋于中断。由于种种原因，1707 年，清圣祖把教皇的使者关进了澳门的监狱。清世宗胤禛因怀疑传教士和其他皇子勾结，对他的帝位不利，在 1723 年又下令除钦天监供职的传教士外，其余一律驱逐到澳门，不许擅人中国境内。从此以后，直到鸦片战争前，清王朝一直顽固地推行闭关自守的政策，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采取充耳不闻、闭目不视、妄自尊大的态度。

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相互学习、交流与磨合的又一次机会。这一年，英国派马戛尔尼来华，要求通商和互派使节。当马戛尔尼使团带着几十只装满各种仪器的大箱子、速射炮和舰船模型踏上中国土地的时候，这些金发碧眼、身穿奇装异服的异邦人最想见的是已经年逾八十、在金銮殿的龙椅上坐了五十八年天下的乾隆皇帝。尽管这时的英“夷”正处于工业革命的高潮之中，号称为殖民地遍及全球的“日不落帝国”；尽管使团乘坐的是装有六十四门大炮的战舰，在他们的礼物中也别有用心地让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占了最大的比重，其中还有一个那时装有一百一十门大口径火炮的英国最大战舰“君主”号的模型，以暗示英国强大的海军力量；然而，当时中华帝国无比富庶强大的传闻，仍然使他们的行动言语处处都透着小心谨慎。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建立与中国的平等外交和贸易关系，为英国这个“世界工场”打开中国这个硕大无比的市场。此时的乾隆虽已年逾八旬，但身体依然健壮，头脑也还不至于太糊涂。他不在北京接见英国使团，偏偏让他们去承德避暑山庄晋见，实际上是打算通过大批生番熟夷对他的跪拜和欢呼的恢宏场景，展示几分天下共主的八面威风。事实表明，无论是乾隆皇帝，还是被视为“向慕天朝的贡使”马戛尔尼，当时都有些一厢情愿。最终，马戛尔尼的使命彻底失

败：乾隆皇帝在以天下共主的身份给了英王一份强硬的“敕书”之后，英人新奇而奢华的礼物被如数原物奉还。使团在严密的监视下，被送回到他们的船上。然而，英国使团的随行人员，却用笔记下了所看到的一切，他们的画师像摄像机似的记录了中国从官场到民间的种种世象，当然也有手持大刀长矛的八旗士兵和破旧不堪的炮台兵营。从此以后，自马可波罗以来在欧洲传诵的中国神话破灭了，野心勃勃的西方人看到了一个封闭、落后、保守和虚弱的东方帝国。可悲的是，这些科学技术的背后所潜藏的，欧美社会已经完成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全新变革，却丝毫没有引起中国统治者的注意。迟至四十七年过后的1840年，当隆隆的炮声叩开古老中国的国门之后，东西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便只有在侵略与反侵略的激烈斗争中次第展开。这时，对中国来说，落后挨打的局面木已成舟，难以挽回了。

从1840年至1911年的七十余年间，西方列强仅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就有五次：1840年至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1856年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83年至1885年中法之战，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至1901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这些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中，几乎每次都是以中国政府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而告终，清王朝的统治也随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现实的危难终于促使一些士人学子从训诂思辨之学和古籍考据中惊醒过来。他们举起“经世致用”的旗帜，为现实的危机谋求出路，从而使中国在东西文化碰撞中从被迫的应战逐渐转变为主动的应对，最终促成中国近代史上师学西方热潮的出现。

面对“西潮东卷”的滔滔大势，中国从应战到应对的转变是朝野上下都历经过的一个心路旅程。从最早睁眼看世界时的“师夷长技”，到“求富求强”的洋务运动，到“广开言路、讲求新学”的戊戌维新，再到清末“新政”，

无不体现这一历史趋势。代表中西不同文明之间冲突与较量的鸦片战争，则成为中国历史这一发展趋势的转折点。西方文化的冲击使中国的传统政治与经济体制发生裂变，并促使民众的思想观念发生着显著的变化。

首先是介绍西方和世界地理、历史情况的书籍被大量刊印,如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华事夷言》,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姚莹的《英吉利图志》等,这些书籍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它们以确证可信的地图地理知识，表明了地球的形状，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证明英、法等国并非是围绕中国周边的蛮夷下国，而是远隔重洋、久被隔绝在地球另一端的文明强国，使一直陶醉于“中央王国”、“天朝上国”的中国人如梦初醒。这种更具理性的新的世界观念，打破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以中华为天下中心、自以为居“天下之中央”的华夏中心观念，中国人第一次不得不面对列强林立、充满竞争和威胁的新世界。

经世派士人在了解与认识西方社会及其文化的过程中，感触最深最直接的，还是其靠坚船利炮取得战争胜利的现实。坚船利炮所代表的西方先进、神奇的科学技术，成为中国文化接受西学的突破口。以魏源明确提出“师夷长技”的口号为标志，中国封闭的文化体系由此走向开放，夜郎自大的国人开始走出古老的传统，走向一个更为广阔的新世界。

到六十年代，在经世思潮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洋务运动，率先将“师夷长技”付之于实践，掀起了东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个高潮。西方各国“动以智勇相倾，富强相尚”，残酷的竞争现实，使洋务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传统社会追求的社会安定、人际和谐的价值观已经不合时宜，当今世界自有它的生存竞争规则和价值标准，这就是“富强”。西方国家靠工商立国，靠竞争致富而大振国威，靠富强而

竞相称霸，靠富强而跨洋渡海，扩张势力，从而使世界力量的格局被完全改变。因此，工商产业兴盛与否，成为新世界中一个国家兴衰存亡的决定性因素。基于这种认识，洋务派力主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借法自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只有自谋富强，方能自立于世，而富强之道则在大兴工商产业，否则终难逃脱灭亡的命运。他们以“富强”这一新的价值标准来观察西方，探求其“富强之道”，这与传统的、封闭的“礼仪至上”的伦理价值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它不再是对社会安定、人际和谐的传统伦理的期待，而是对社会力量、世俗目标的现实追求，这种以发展工商产业为中心的“崇尚富强”的价值观念，是对世界以工业化为标志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潮流的思想认同。洋务实业的兴起，则是这种新思想与新认识的初步实践。

1895 年 4 月末，甲午中日战争北洋舰队全军覆灭的噩耗传遍京城，进京参加会试的十八省举人，共推南海康有为主事，草书一万八千余言，集众一千三百多人上书光绪帝。这个大胆的举动，展示了中国先进的知识群体终于抛弃了“坐于广厦细旃以谈名理”的陋儒心态，而“身入于惊涛骇浪以应事变”，从而拉开了维新运动的帷幕。它标志着中国人民的“师夷长技”，已由洋务运动仅从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致强致富之道，转至从政治制度层面对“欧风美雨”的冲击做出回应。

戊戌维新运动作为政治与文化领域内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从一开始就是经由两个取向展开的。其一，通过“开绅智”,“兴绅权”,更新地域乡儒的知识结构,争取击破儒学地域化以后所构筑的深层政治堡垒，以某一地域为中心，成为全国变革的模本与旗帜。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陈宝箴诸人均致力于这个目标。其二，通过构造“政治神话”以改变以孔子为象征意义的宗教符号，形成

政治变革的普遍心理背景；与此同时，把王权预设为具有领袖魅力的权威人物，然后通过“政权”与“王权”之间的张力运动，自上而下地强制推行变革，康有为即是此项试验的积极推行者。

这场围绕王权为核心的变法运动，引起了一场经天纬地的大震动，并由此形成“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的感人局面。在 1898 年 6 月至 9 月的维新运动高潮期间，清廷接连发布了一百多道上谕，颁布各项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新政。作为清廷自上而下的一种社会变革，戊戌维新本是欲图救清王朝于危亡之中，使中国融入世界近代化的潮流，重振中华帝国的雄风。尽管在旧势力的联合绞杀下，戊戌君子只能“我自横刀向天笑”；尽管中国社会失去了一次难得的王朝体制内自我改良革新的机遇，封建君主专制体制已经成为近代文明发展的严重桎梏，腐朽的清王朝此时已经难以或不可能成为中国跨向近代化的设计者和领导者，但是，由于浩荡的世界大潮所致，伴随新世纪而来的中国第一声却又是清末“新政”的到来。应该说，近代中国师从西学，从被迫应战到主动应对，虽然这个过程由局部开始而且进展非常之缓慢，然而对中国政治的发展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它为中国发展近代政治与经济，应对世界潮流提供了契机，并在民众的思想观念中埋下了葬送旧的君主专制的伏笔，为日后中国社会的变革或者革命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从而奠定了中国适应世界潮流的最初基础。

夹缝中生长的近代企业

浩荡的世界大潮在中国社会经济领域中掀起的第一朵浪花是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兴起。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工业近代化潮流首先在异于传统社会的口岸商业城市发轫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